

## “一带一路”特别策划(三)

“一带一路”视阈下国家形象构建的  
巧实力探析储殷<sup>1</sup> 黄日涵<sup>2</sup>

(1.国际关系学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 100091; 2.华侨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语境下,当代国家应整合“软实力”与“硬实力”,形成“巧实力”以应对单凭硬实力或软实力已难以解决的挑战,这正在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径。中国的“巧实力”构建在本质上是对国家实力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再塑造,是当代中国在组织机制上和文化价值上的整合与超越。考虑到“一带一路”地区复杂的政治、安全与文化环境,运用巧实力提升国家的影响力,应成为我国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巧实力; 中国国家形象; 海外利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 D24;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425(2016)02-0078-07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海外利益正快速扩大。“一带一路”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44亿人口,经济总量达21万亿美元<sup>①</sup>。在这样巨大的地带,进行战略推进,不可避免地将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并涉及沿线各参与国之间深刻的利益协调<sup>②</sup>,而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在缺乏军事力量的硬实力的保障下进行的,因此如何运用“巧实力”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就成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情况的复杂性,民族众多、宗教形态多样、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高度多元<sup>③</sup>,民心相通的任务尤其艰巨。如果民心不通,则“一带一路”很有可能

由于交通的便利而导致更加频繁、激烈的部族冲突、教派冲突与文化冲突,并对于“一带一路”最终能否成为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起到阻碍的作用<sup>④</sup>。更为重要的是,民心相通的过程实质上是中国世界观、价值观在“一带一路”中由中国话语上升为世界话语的过程,它最终将成为中国将“一带一路”地区塑造为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础。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国际传播的有益经验,因此在民心相通的操作层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在一定时期内,如何借鉴国外运用“巧实力”的经验,来解决当前“一带一路”上的问题就成为了一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现实选择。

收稿日期: 2015-08-21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世界政治2.0时代的新型大国关系研究”(13CGJ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储殷,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黄日涵,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 一、巧实力的概念及其与硬实力、软实力的关系

2002年,前克林顿政府欧洲和加拿大事务特别助理安东尼·布兰肯在《赢得观念的战争》中首次提出“巧实力”一词,认为美国应当重新审视其单边主义政策,全面协调使用美国的实力<sup>⑤</sup>。2004年,苏珊娜·罗塞尔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巧实力》一文<sup>⑥</sup>,认为美国应当在全面、均衡、谨慎的原则下拓展美国的全球利益。“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重新思考软实力》<sup>⑦</sup>和《安全与巧实力》<sup>⑧</sup>等文中指出,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语境下,应整合“软实力”与“硬实力”,形成“巧实力”以应对挑战。时至今日,“巧实力”逐渐成为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区域治理、公共管理、文化传播等多学科的焦点议题。

“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三者彼此密切相关,又截然不同。首先,三者所指涉的对象或者说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新的国际权力结构中,国家作为基本主体如何生存、发展,获其所需的问题。三者所要达到的理论目标和现实状态,概括来说是一国在这个权力结构中,通过自身努力和环境调适,抵达最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位置,对于周边和世界,具备与其综合实力相适应的权力分配。从这个角度来说,“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关注的核心,是权力关系。因此,理解三者概念的中心,就应当在“力”上。在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当中,“权力”不是实物,而是一种非均衡、不对等的压迫性关系,它属于关系范畴<sup>⑨</sup>。对此,约瑟夫·奈从力量类型的角度对“软实力”予以进一步界定,认为力量分为行为力(Behavioral Power)与资源力(Resource Power),前者指获得预想的结果的能力,后者则指通常与达到预想结果的能力相关联的资源的拥有<sup>⑩</sup>。可见,“硬实力”与“软实力”中的“力”,更偏向于一种为获其所需而使用的行为权力,而不是组成这种权力的资源拥有。可以说,不管是“软实力”“硬实力”还是“巧实力”,涉及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作为主体,为占据有利位置,获得自身所需的权力,一种改变他者,强化自身的权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分析,有不少学者认为“Power”应该译作“权力”而不是“实力”,以指明这种权力—利益关系<sup>⑪</sup>。

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三者的核心,那么,“软”“硬”“巧”则指的是获得这种权力、拥有这种能力所依赖的行为组织方式。以偏重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去获得它,是“软实力”的权力组合方式;以军事、经济等方式去获得它,则是“硬实力”的权力组合方式。因此,“巧实力”(Smart Power)中的“巧”指的是复合地、平衡地、准确地、灵活地运用各种资源以重新整合形成更高层次、可更精确控制和收效更丰厚的一种全新的行为权力,是一种将“软实力”的吸引和“硬实力”的威压结合起来的一种策略<sup>⑫</sup>。可以说,“巧实力”是“力的哲学”或者说“力之力”。

## 二、巧实力构建的处境与定位

Ernest J. Wilson III在其《“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一文中指出,“巧实力”之所以成为必须,成为新的理解行为权力运作和结构的方式与策略,主要是因为整个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在近十年来发生的巨变。整个世界都在变得更加复杂,对于美国自身而言,“从智能炸弹到智能手机到智能博客,每个国家都在变得更加智能,就连基地组织也在使用他们的跨媒体平台;任何一个想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主体都应该围绕‘巧’来构筑策略”。

对于中国而言,在“一带一路”中“巧实力”的建构道路所面临的前提性问题也必然是中国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当中,对于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格局的总体判断,并在这个理论判定和现实处境的二维视野中选取位置、调整策略。准确地说,对于“硬实力”一方,中国处在怎样的实力对比格局中;对于“软实力”一方,中国又置身于一个怎样的国际象征、符号舞台之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决定中国“巧实力”构建的基本指向和总体目标,也将直接决定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具体的组织策略和行为架构。

对于“硬实力”一方而言,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方面的学者已经有过不少准确的分析,简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战略资源占世界的比重持续上升,已经成为了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和整个世界具有巨大影响的大国<sup>⑬</sup>。与此同时,在未来一段历史时期当中,中国与其他大国一样,处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

的大变动时期,与美国作为政治、经济、军事霸权的共存和多极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权力布局调整,构成了这段时期中国“硬实力”构建的总体战略前提。

相较于中国“硬实力”所处的地缘和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来说,中国“软实力”所处于的全球象征/符号舞台的情形则更为复杂。总体来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与“民主”“人权”“自由”等主导价值紧密相连,依然充当着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虽然在近几十年来,这一神话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呈现多极化,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进入现代性末期、走进后现代文化语境以来,资本主义所主导的意识形态神话始终面临着内外重重压力。虽然文化/意识形态权力格局相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来说,常常是敏感、复杂而多变的,但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当中,资本主义特别是跨国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自由化依旧是中国“软实力”构建道路上难以避免的文化/意识形态困境。在这种情形下,想要彻底扭转这一意识形态霸权,并非易事。在这一困境之下,中国“软实力”想要实现突围,就必须提出现有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方案之外的另类可能,展开真正的“认识论想象和民主想象”<sup>④</sup>,这种想象须真正赢得世界大多数民众的心灵和智慧,真正超越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高污染、高消费、高能耗”的现有路径。唯有如此,才可能突破西方世界编织的意识形态牢笼,形成中国自觉自省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本土与全球想象。在这方面,最为成功的案例就是中国于近几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与发展的孔子学院。它的实质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为人类提供超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新的选择,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良好的中国形象巧妙地进行输出,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大同”观念将成为构筑中国话语、中国形象的关键。

必须指出的是,软实力的根本基础是“价值观”,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维度的形象宣传很难实现实际意义上的“软实力”建构。因此,如果中国“软实力”运动的一个目标是反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种种污名,那中国完成的应当是能够引起“一带一路”上各个国家共鸣的“亚洲价值观”或是“和平与发展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中,不同国家、民族的“平

等与尊严政治的逻辑”能够扩展到“一带一路”上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不仅限于抵抗西方媒体不公平的言论”<sup>⑤</sup>。当然,这两重目标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不能提出相对于现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之外的另类想象,那么内在外在的协同努力就依然只能在西方世界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无法寻找到有利的位置;同样,只有内外一致,才真正形成可能具有吸引力,可供其他国家和民众模仿和追随的文化/意识形态想象。就此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礼法合治、法治中国的理念,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如何把握这一重要主题,巧做文章,将是未来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关键所在。

### 三、巧实力构建的策略选择

“巧实力”这一概念提出伊始,就带着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它不仅仅是美国学术界创新构建的理论框架,更是美国现实政治外交实践的产物。可以说,“巧实力”从一个概念成长为一套成熟有效操作体系的轨迹当中,不论是学者还是政治家,都格外注意它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平衡控制,几乎任何一份关于“巧实力”的报告,任何一篇关于“巧实力”的学术论著,都鲜明地体现出服务于现实政治外交策略的倾向。Ernest J. Wilson III 指出,“巧实力”需要一个充分整合的机制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要打破从属性的、对立的、割裂的组织关系,要在招雇、训练、激励、擢升等各个环节都实现跨部分/部门合作,将国务院视角与国防部视角统合起来,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的利益服务。同样的,约瑟夫·奈指出:不管谁将当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都应当找到适当的实用方法,在提升价值与调整修辞之间找到“巧实力”的平衡,以实现全球各大崛起力量的软化和遏制”<sup>⑥</sup>。

进一步来说,这种机制上的实用主义背后,是行为、决策和谋略在文化/价值上的深刻变迁,这种机构的组织安排不是简单的机械调整,而是涉及到整个组织面向更复杂、更敏感的外部环境而作出的深层次的文化/世界观的嬗变。这种变化,需要在了解和掌握“软实力”“硬实力”各自内涵和内部互动规律的基础上,对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

态环境作出准确判断,从而形成一套客观准确的自我认知体系,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意愿和能力作出确认,最后,要将现有的“软实力”“硬实力”的资源视为可供选择的工具库,在上述信息得到基本掌握之后,按照需要和条件进行选取和使用,在此过程当中,加强两方的联系和沟通,形成从“为”谁负责到“与”谁负责的新的组织文化,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迅速定位、及时部署、务实行动,最终获得主体所需,达到短期或宏观的战略目标。可以指出的是,这一整套“巧实力”的整合方略从根本上还是围绕现实主义的政治外交原则展开的。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软实力”相较于“硬实力”来说,更多的指向于文化理想主义,与讲求现实利益的“硬实力”有着难以调和的张力。然而,从“巧实力”的理论维度的实践策略来看,“软实力”和“硬实力”完全有可能也完全有必要统合在这一现实主义的框架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软实力”并不是高于或者存在于“硬实力”的另类维度,也并不只是存在于文化、价值和审美视野当中,“巧实力”则正是为“软实力”和“硬实力”提供了这种现实主义的整合框架,使得这两种行为权力在概念规范和环境调适的基础上,集中指向现实政治外交策略及利益提升的最终旨归。

结合中国的状况,不论是在机制调整层面还是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层面,都有可期利用的现实条件。从机制调整的层面来看,“软实力”与“硬实力”两方在中国并不存在 Ernest J. Wilson III 所担心的互相割裂、彼此竞争的情形。中国的行政组织和决策模式,依然属于类似于威权主义体制的东亚模式,在这种组织和决策体系之中,形成统一政令、贯彻整合决策相比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会节约不少行政成本。在政府对于各类资源统一调配的基础上,可最大限度地节省两个或更多部门因竞争而损耗的代价。在理想状态下,“软实力”与“硬实力”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迅速调整自身位置和战略部署,这就需要决策部门在最短的反应时间当中作出最合适、最有效的行动规划,这种理想状况在中国则需要建立在现有行政组织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改良和渗透理性科学的科层制组织决策机制,同时结合在转型时期的后发展国家优势,形成机制变革与现实政治外交策略同步推进的良性态势。从长远来看,国内社会稳定善治、对外政策灵敏准确的行政组织决策体系

所依赖的,正是这种东亚后发展国家所特有的“凝聚性权威国家发展模式”。

从文化/价值的视野来看,中国对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整合策略有着丰富的传统资源值得挖掘和借鉴。其实,“巧实力”对于“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整合策略在概念和理论上虽属创新之举,但这种策略已有不少现实经验,在这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颇具价值的积淀和结晶。其中,中国古代的“王霸之辩”就与“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有很多呼应和对照。一般来讲,儒家主张“王道”,以仁政统驭天下,而法家则主张“霸道”,以严刑峻法威服天下,“王道”与“霸道”之间激烈的争论一直持续于整个古代政治思想史。而进入到秦汉之后,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开始在“王霸”结合的政治实践中汲取新的智慧,汉宣帝曾公开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记》)。东汉王充从“养德”与“养力”的角度对这对关系展开论述:“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sup>⑩</sup>。可见,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谋略中,霸道施以力,王道施以德,不战而屈人之兵。“硬实力”可以开疆拓土、攻城略地,但由于人心未服,难有长效。在使天下倾服和归顺方面,“服人以德不以力”的“软实力”是任何有形的硬实力所不能比拟的<sup>⑪</sup>。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在“王霸”的辩证关系中已经形成了足够明智的结论:“软实力”和“硬实力”两者应在对于现实处境清晰判定的基础上,实现有策略有目的的巧妙结合,从而形成主体所期待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

#### 四、巧实力构建亟须解决的四个问题

巧实力的运用根据其场域不同,其方式方法亦有不同。根据自2014-2015年期间对一些政府部门和中国走出去的多家企业的调研来看,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目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而言,与构建“巧实力”相关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巧实力,很有

可能会随着经贸关系、人员往来的增多反而受到负面影响。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文化差异尤其是宗教差异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汇集了全世界四大宗教,即中亚、西亚、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欧洲、亚洲地区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教,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如果考虑进华人地区的儒家文化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前苏联地区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一带一路”上有六大差异明显的文化。如何寻找与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社会的有效交流方式,寻求这些社会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国软实力的关键问题。

根据目前对走出去的企业的调研来看,一方面,我国在宗教地区尤其是伊斯兰教地区的文化交流项目,虽然高度重视宗教差异、社会习俗等敏感问题,但是在交流上仍然存在着世俗社会对于宗教社会难以避免的认知障碍。我国的有关部门在运用所在国、地区文化资源,阐述“一带一路”方面,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常常出现自说自话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前苏联长期奉行宗教与民族的压迫政策,一些宗教地区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存在先入为主的排斥情绪。这造成了所在国上层对华友好,而民间对华印象不佳的情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反恐形势严峻,一些部门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政策失当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被有意识地歪曲和放大,从而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

第二,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由于我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大型工程多通过大中型国有企业来完成,因此企业的形象往往与中国国家形象密切相关。尽管,国有企业也是市场经济行为主体,但是许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却通常将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视为政府行为。这就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它们不仅需要高质量地完成承建的项目,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要充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发挥企业外交的作用。

根据目前对走出去企业的调研来看,中国企业在海外虽然高度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方面是缺乏熟悉当地文化、善于与当地的媒体、非政府组织沟通的人才,经常

造成交流上的不畅,导致正常的经营行为被妖魔化。另一方面,是管理员工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企业员工在当地行为失当,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尤为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中国的一些企业往往采取一刀切式的封闭管理模式,将工作人员与所在地区社会完全隔离,造成了基建易联、民心难通的现象。

第三,与非政府组织交往的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与地区,非政府组织十分活跃,甚至基本上成为了民间社会最重要的代言人。我国的有关部门与大型国有企业,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侧重走上层路线,往往缺乏与非政府组织交往的经验。根据目前对走出去的企业的调研来看,我国企业基本上对当地的非政府组织评价消极,通常将其视为“找麻烦”的对手,而缺乏与其互动、为我所用的能力。这就产生了我们的有关部门与企业虽然人在当地,但是仍然不接地气的情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缅甸等一些东南亚国家,非政府组织大多受美、日资助,在这些对华怀有敌意的非政府组织的有意策动下,这些国家的底层民众经常会对我国一些“一带一路”的项目产生抵触情绪。

第四,可持续地经营人脉的问题。软实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当地的人脉。“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都是“人治色彩”较重的国家,在很多时候制度是虚的,关系才是实的。“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顺畅与否,往往取决于人脉。在欧美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中,这种广结人脉的现象其实极为常见。他们的工作不仅力度大、针对性强,而且极其全面、灵活,往往是外交、军事搭建平台,商业、文化跟进运作。比如在英国政府的对外军事培训中,往往都有大公司的“插班生”。相比之下,我们做的尚有提升空间,最主要是观念问题,我国每年各方面涉外活动都很丰富,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这些关系大多是单向的,我们的一些部门缺乏为企业搭台的主动性。

与此同时,有些国有大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往往也不注重人脉的建立,把它当做外交部门的事情。在对外活动中心态保守,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会自我隔离于当地社会。有外国朋友曾经问笔者:“你们几千人的一个工地,挖上深沟、筑上高墙,还弄上电网,从来没有人外出,我们这里有那

么乱吗?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在很多时候,这样高筑墙、多积粮的做法仅适用于具有严重安全风险的地区,在大多数地区是毫无必要的,但是我们的企业就容易“一刀切”,结果是辛辛苦苦干了几年,还没交上几个过硬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这往往与经营人脉所需要的长远眼光相悖。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一些部门和企业总是侧重于经营可以短期见效的人脉,而对长线布局缺乏兴趣。这带来了,“烧热灶不烧冷灶”,只和台上的人称兄道弟,不和台下的人保持关系的短线做法,结果往往是台上换人,整个投入就打了水漂。

### 五、运用巧实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选择

鉴于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为了构建“一带一路”上中国的国家巧实力,让中国的影响力不能仅仅局限于所在国家的上层,还能够扎扎实实地“沉下去”,让“一带一路”沿线的社会大众能够感受到中国的魅力与善意,我国的有关部门与企业需着眼于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重点“从娃娃抓起”。要想争取人,要想打动人,关键在于我们提供的东西能否帮助他国改变命运。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办小学、办中学、办技校才是真正给当地人大实惠的事情,要让文化交流走向实在。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建立起国内大学与援建中学的保送机制,或者建立起海外中国企业与技校毕业生的联动机制。一方面,切切实实地将中国影响与这些学生和学生家庭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在这些孩子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

第二,要依靠民间力量,培养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商会与非政府组织。我国每年的对外援助不少,但大多以官方名义进行,这样既给了反华势力以挑拨离间的口实,也往往缺乏竞争、绩效不佳。培育涉外民间团体来承包这种项目,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方面可以通过民间团体之间的竞争提高资金的使用绩效,另一方面又可以更为灵活也更为有效地接触到所在国的社会大众。要以亲华的非政府组织来制衡反华的非政府组织。

第三,要重视利用爱国教会与跨境少数民族的资源来推进民心相通。近些年来,我们已经比较注意搞好与侨界和当地华人社区的关系,但是这些努力往往受限于种族、语言与文化,对于非华人群影响力相对有限。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更普世的方法来跨越这种族群、文化的界限。一方面,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较为敏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可以考虑佛教、爱国天主教、爱国基督教等中国化的宗教资源。中国的宗教完全可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走出去,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在这方面,西方的教会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另一方面,熟悉当地文化、立场坚定的跨境少数民族干部也完全可以成为我国国家形象深入当地的有效桥梁。这种做法其实已经被我国一些国企所采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六、结 语

“巧实力”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国际秩序构建,在两个方面的确存在一定的疑问。一方面,作为服务于美国霸权的软实力理论,其实质仍然是一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竞争的工具。它是否能够适应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念”“大同观念”,是否能够超越西方的“私利”与“霸道”,体现中华文明的“仁义”与“王道”的确值得探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力之力”的艺术,它是否真的能够游刃有余地调节“一带一路”沿线极为丰富、多元的文化之间的张力。前者是西方之术是否能够为中国之道所用的问题,而后者则是西方之术是否能够承载东方现实的问题。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的精神实力与物质实力崛起都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中国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一样,都浸泡在全球化的激流之中。一方面,我们仍然拥有与众不同的本质,另一方面,我们又正在与世界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如何用一种他者能懂的话语,潜移默化地传递我者独有的观念,将是我们长期面临的问题。就此而言,借鉴“巧实力”的理论来推进民心相通又是合理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来自于在国际事务中更为老练的他者的经验,它虽然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却能为我们提供在强力不足的情况下,建构秩

序、整合世界的有益借鉴。

注释:

- ①袁新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理论月刊》,2014年第11期。
- ②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
- ③纳文汇:《“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语境中的宗教文化建设与调适》,《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 ④李向阳:《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
- ⑤Antony J.Blinken, “Winning the War of Idea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2, pp.101- 114.
- ⑥Suzanne.Nossel, “Smar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 / Apr 2004, pp.138.
- ⑦Joseph S. Nye Jr., “Think Again: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3, 2006, pp.22- 27.
- ⑧⑫⑩Joseph S. Nye Jr., “Security and Smart Power”,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8(51), pp. 1351, 1353, 1354.

- ⑨⑪李智:《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策略——兼与阎学通先生商榷》,《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期。
- ⑬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Sep. /Oct. 1998, pp. 86.
- ⑭门洪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 ⑮赵月枝:《“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 ⑯Wang Hui. Theodore Hutters, ed.,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⑰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页。
- ⑱王勇:《王霸之辩与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思想》,《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 Probe into Smart Power of National Imag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HU Yin<sup>1</sup> HUANG Ri-han<sup>2</sup>

(1.Depart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91;

2.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At new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 present-day countries should group “software” and “hardware power” into smart power to meet challenges failed by either hardware or software power singly, simply an important approach advocated in “One Belt and One Road” boosted by China. China’s smart power being constructed in essence is national strength being reshaped in post-modern context and modern China being grouped and surpassed in organization mechanism and cultural value. With respect to complex political, security and cultural setting alo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applying smart power to promote national influence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Smart Power; China’s National Image; Overseas Interest Protection

[责任编辑:马瑞雪]